

●博导文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

蒲勇健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蒲
勇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0. 4

(博导文丛/龚策主编)

ISBN 7-5075-1016-6

I. 经… II. 蒲… III. ①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中
国 ②产业政策—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46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875 印张 23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18.00 元

导 论

一、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概况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需要大力推进的重大战略之一,它是我国经济发展告别多年的粗放增长,走集约增长的内源发展道路所必需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内含深刻、涉及面广,不仅需要整个经济社会在观念和体制上进行深刻反思和全面改革,而且对现有主流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对经济理论自身也提出了变革和发展的要求。这种挑战和要求已经于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掀起波澜,经济学家们对于诸如“集约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内含型增长”和“外延型增长”等概念的内含界定发表了各种意见,尽管许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在理论上仍然缺乏一种系统表述经济增长方式的数学模型及相关的测量指标体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会涉及到经济发展问题中的各个层面,其中所涉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当在理论上基本确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即目标增长模式或目标增长方式)之后,从研究的逻辑上看,接下来的一步就应该是研究如何从政策上贯彻、推进和落实将现有增长方式转变到目标增长方式的过程,而这种政策努力的着力点就包括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最终落实到相关或所需的产业政策上。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可以说是密切相关

的,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应于不同的增长方式。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含有大量落后和粗放经营的各种产业,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人力资本水平低,那么,很难预见经济增长可以持续下去。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率上升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十分关键的要素。近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东南亚诸国在过去 20 余年间看似高速增长但缺乏内源持续增长动力之缺点。从经济理论上,内源持续增长动力应该是技术创新或由其引致的技术进步速度,东南亚诸国在过往 20 多年中的粗放增长是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也就是对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源分布重新加以组合,从而从整体上凸现技术进步或增大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可能是增大经济增长可持续程度的一条重要思路。

本课题研究就是基于上述思路而展开的。首先,我们在理论上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内含、数量刻画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理论工具运用和背景都站到了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学术前沿上,并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十分活跃的新增长理论在模型上进行了创新,即在罗默的人力资本学派内生增长模型中纳入了不可再生资源约束,并由此上升到可持续增长高度,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确定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根据这种模型,导出可以用来测算增长方式可持续程度(集约度或粗放度)的数量指标,并对指标的实际测算进行了实证演示和分析。

由于将可持续增长确定为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在理论研究上就自然把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它将是人类社会经济在 21 世纪的主导发展模式,也是目前的学术研究热点。可

持续发展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各个层面,尤其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与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可持续发展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原则,是最高层次的发展导引原则或中心目标。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也作为一个主题,并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可持续经济增长,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其中心内容就是满足或适应可持续发展基本要求和中心原则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本课题在理论上的主要创新就是对可持续增长的内涵进行系统阐述和论证,并构造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和测量指标体系。在理论创新上,我们将在提出增长方式转变目标模式就是可持续增长方式并系统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并发展新增长理论中的内生增长模型,构造出刻画经济增长集约程度的数学模型和测算指标体系。在研究中,我们所以给予指标体系构造以充分的重视,主要是基于课题的应用性和成果的实用性(可操作性)。

本课题研究在总体上按研究的属性分为两大部分,即理论研究(含理论的初步应用)和实证研究。在课题报告中,这两部分分别以两篇内容加以阐述。在第一篇的理论研究中,主要关注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的数量刻画(包括外生和内生增长模型的刻画)、指标体系构造及理论成果的示范性应用研究等。在第二篇的实证研究中,主要着力于重庆市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分析和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产业政策研究与建议等。

本课题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目标模式及完成从现有增长方式向目标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如何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而为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回答更为基本的问题,即对应于目

标增长方式,我们所需要确定的目标产业结构是什么?在理论研究的第一篇中,我们在完成了增长方式的数量刻画模型建立工作之后,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我们的研究十分注重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理论研究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而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综述,主要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增长的外生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第二,尽管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创新上主要表现在对新增长(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上,但也使用外生增长模型进行了增长方式数量刻画,因为外生和内生增长模型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另外,外生增长模型目前还比较适用于我国的实证分析,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内生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所需的长周期时间序列数据在我国还未有统计,故在实证分析中先借用外生增长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回归,当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出来后,再转换为内生增长模型的参数估计。具体的做法可参见第七章。

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思路可通过图 1 的框图加以表达。

产业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来自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排序,这种优化排序的指标就是集约度指标,即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测量指标。在实证研究部分,还获得了一系列除不可再生资源影响以外的其它指标,主要涉及环境指标,从而构成两类指标体系,即测度增长方式可持续程度的集约度指标和外生指标构成的体系和实证研究部分中获得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投入的平均指标构成的体系,这两类指标体系又构成整个课题研究的一个大的指标体系。

在课题报告中,产业政策建议散布于实证研究(第二篇)中的各个实测结果分析中,最后对产业政策的贯彻给出了简明的概括性原则和集中性建议。

二、增长方式转变:概论澄清与现实的需要

对于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研究者来说,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前者对于后者既非充分条件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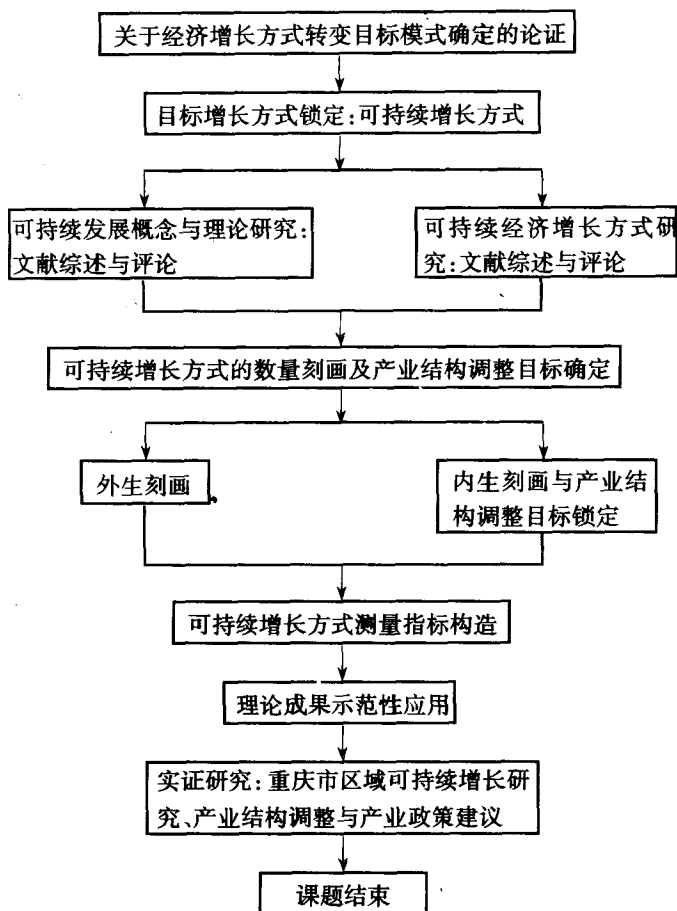


图1 课题研究的进行路线示意

非必要条件。但是,无论是 70 年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还是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两者加以联系。由于现代增长理论具有一种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主流经济学家用此框架分析可持续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将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头等大事,且这种转变存在可持续发展背景。尽管从理论内涵看,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可持续存在重大区别,但增长可持续在可持续发展中应扮演重要角色。本课题并非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而是研究在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下增长方式的特点或称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所以,本课题工作实质上仍属增长经济学领域,但在分析中涉及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结构等,具有跨学科特点。因此,这项工作本质上是 70 年代“可持续增长经济学”的继续。70 年代的环境运动使经济学家在增长方程中加进了反映资源环境因素对增长轨迹的约束并分析这种约束对增长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可持续增长经济学”这一增长经济学分支。我们将在第四章系统综述这一领域的成就。也许正是经济学家在 70 年代以来在此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并获得了系统性结论,在目前急剧升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热潮中,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冷淡。因为他们认为许多问题早已弄清楚了,目前的研究热潮仅仅是环境运动甚至国际政治上的一种过热。但是,这种想法存在一种致命的错误——已有的可持续增长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工具,而目前的新增长理论迅猛发展,使可持续增长分析面临再度复苏的契机——说明有必要用新增长模型重新研究可持续增长,这正是本课题的基本工作。

目前国内流行的增长方式研究,在本质上与国外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研究异曲同工。以下对此进行论证。

中央政府作出转换增长方式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如下事实: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依靠扩大建设规模,大量增加要素投入。这种增长方式在带来较高增长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负面效应,即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效益低下等。我国资源利用率仅 30%,低于发达国家的 40%。我国单位 GNP 耗能为日本的 6 倍,美国的 3 倍,韩国的 4.5 倍。12 种主要原材料的消耗我国比发达国家高 5 到 10 倍以上。我国 131 条城市河流中,严重污染的 28 条,流经城市的河段 80% 被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堆存 6 亿多吨,历年总占地面积 5 万多公顷。我国并非资源充裕的国家,目前不少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石油为世界人均量的八分之一,天然气为世界人均量的二十分之一。我国人均能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 80 位。我国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1979-1990)为 30.3%,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相差 20 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1.7%)。国内文献称这种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其特点总括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增长方式,忽视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不重视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曾培炎,1995)。由于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社会净产值率(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值之比)长期以来呈不断下降趋势,1992 年比 1978 年下降 11.21 个百分点。“六五”期间每增加 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平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3.2 亿元,“七五”期间减少到 2.2 亿元,“八五”期间预计为 2.3 亿元。从企业经济效益来看,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80 年为 25.2%,1994 年下降到 10.5%;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1980 年为 25.6 元,1994 年下降到 14.4 元。目前,我国机电行业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约 15~20 年,主要机械产品中达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只占三分之一,达到目前世界水平

的只占 5%；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电子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三个发展阶段。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 25~30 年以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淘汰的平炉炼钢工艺，在我国钢产量中约占 15%，连铸比世界平均为 70%，我国只有 40%。纺织工业中，全国 4100 多万锭有四分之一是需要淘汰的设备，达到 80 年代先进水平的不到 40%。在农业方面，水、肥利用效率低。发达国家已向喷灌和滴灌发展，而我国仍主要是大水漫灌，跑水、漏水严重。水份利用系数，以色列为 0.9，我国仅 0.3~0.4。我国化肥有效利用率仅为 3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水污染 1991 年来每年以 10% 数量增加，全国每年排放污水 350 多亿吨。全国 500 多个设市的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全面符合一级标准的不到 1%。另外，粗放增长的结构特征是不合理产业结构，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小，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并存。目前棉、毛纺生产设备利用率只有 75%；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卷烟、汽车和普通机械等生产能力闲置约 1/3~1/2。不少行业企业规模过小，生产集中度过低。我国有汽车厂家 140 个，1994 年汽车年产量仅为 140 万辆，80% 的厂家不足 1000 辆。而日本、美国等国家，一家汽车厂年产量一般都是几十万辆，甚至几百万辆。世界上炼油工业企业生产规模平均年产 500 万吨，最大炼油厂年产 3000 万吨，而我国 116 个炼油企业平均规模仅为 167 万吨。地区产业结构也在低水平上趋同。同时产品质量差，几个不顶一个用，造成大量浪费。近几年一次产品合格率仅为 60%。我国煤炭、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纤等重要原材料产量已位居世界前五名，但由于产品加工深度不够、附加值低，工业增加值却排在世界第 12 位。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在后果是制约了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

“九五”期间,要保持 8% 左右的增长率,下个世纪前 10 年仍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实现这个要求,若按传统增长方式,就必须大规模增加投入,需要相当高的投资率。据测算,1982 - 1993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名义 GNP 增长率之比为 1.4:1,按此投资弹性,“九五”期间则需要总投资 12 万亿~13 万亿元,年均投资率要高达 35.1%~35.7%,年均投资为 2.4 万亿~2.6 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需求是国力难以支撑的。据测算,“九五”期间,实现年均 8% 左右的增长率,若按现有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弹性,能源供需差率达 20% 左右。下个世纪前 10 年,能源供需矛盾更大。据估算,2010 年一次能源需求量将超过 19 亿吨,重要原材料也需大量增加,如需钢 1.7 亿吨。要达到这么多的能源、原材料产量,将造成资源过量消耗。我国耕地、水、矿产等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不足,目前一些重要资源已相当紧张,全国 300 多个城市缺水,人均耕地已减少到 800m²,石油现已成为净进口国。资源过度开采消耗还将加剧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显然,靠大量消耗占用资源换取经济较快增长的路子已再也走不下去了。因此,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据测算,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 35%,每年则可节能 3 亿多吨标准煤。按 80 年代的技术水平,到 2000 年我国需要钢 1.2 亿吨,若全国在 90 年代能达到广东省 80 年代单位 GNP 的消耗水平,则可节省钢材 3500 万吨。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量并不一定和经济增长同步。日本 80 年代以来,GNP 年均增长 4.4%,能源消耗量仅增长 1.1%。美国 GNP 的材料消耗中,每亿美元的钢材消耗,1970 年为 1.23 万吨,1980 年为 0.42 万吨,1985 年下降到 0.28 万吨。这是技术进步、替代资源和消费方式改变的结果

(曾培炎,1995)。根据“‘九五’规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我国在 2000 年要使第三产业比重由 1994 年的 32.7% 上升到 35% 左右,积极开发高技术产业,并力争今后 15 年使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由 28% 左右提高到 50% 以上。因此,中央作出转变增长方式的决策完全是基于我国发展战略目标与国情的实际状况,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因此,研究增长方式本质上就是探索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增长持续性问题,基本等同于 70 年代以来国外的可持续性增长研究。

那么,增长方式转换的目标模式如何?国内文献大多称这一目标模式为“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与“粗放型”是相对的,两者的概念内涵目前还存在多种说法。

在国内当前的增长方式研究中,有几个术语成为争论的焦点,它们分别是“集约型”、“粗放型”、“内含型”和“外延型”增长方式。增长方式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 60—80 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的概念。国内文献将增长方式定义为增长过程中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夏兴园,1996)。前苏联从 1928 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二战期间外,经济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但 1958 年以后,增长率开始下降,促使前苏联及东欧学者对造成下降的原因进行讨论,他们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示(《资本论》第 2 卷,《马恩全集》第 24 卷第 192 页),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增长的“粗放型”和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增长的“集约型”。他们指出,苏联过去的增长,是靠增加要素投入取得的,忽视了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一重要问题。要解决苏联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问题,就要实现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集约”与“内含”、“粗放”与“外延”是否同

义,国内文献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两对概念不同义,其理由与其对集约与内含、粗放与外延的理解有关。他们认为,这些概念最早起源于农业经济学,后来才被引申到其它方面。他们称农业中以较少量生产资料和劳力,投放在较多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为粗放经营制。集约制指用较多生产资料和劳力,投放在较少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广义地说,若自然方面向“大”的方向发展,而人力方面向“小”的方向发展,就称为“粗放”;反之则称“集约”。他们认为这种划分标准可直接推广到工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因此,工业中的粗放表现为一定劳动和资本占用和消耗较多的土地和原材料;集约表现为一定的土地和原材料的占用、消耗,投入了较多的劳动和资本。这种意见认为“外延”指靠要素量的增加来扩大生产规模,“内含”指靠挖掘潜力、素质提高来增加生产。农业中土地的增加是强化粗放型的因素,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却是强化集约的力量,而在外延或内含的划分中,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大量增加都表现为“外延”的特点。但农业粗放经营的特点恰恰是少投入资本和劳动,集约经营的表现倒是大规模、高投入(劳动和资本)。由此推理,他们认为“集约”与“内含”、“粗放”与“外延”不同义(崔援民等,1996)。另有学者对“集约经营”和“粗放经营”与“内含投入型增长方式”和“外延投入型增长方式”进行了区分(卢希悦,1996),但这种区分本质上并无多大意义。认为“集约”和“粗放”与“内含”和“外延”同义的意见较多,他们对这些概念最早来自农业经济学等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奚兆永(1996)指出,认为“集约”与“粗放”这一对概念起源于前苏联和东欧或农业经济学,以及它们的上述界定方式都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概念起源,他认为至少可追溯到上一世纪,并且也非来

自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创立于1900年,但这一对概念的出现要早得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粗放地租与集约地租”辞条的作者吉多·蒙塔尼认为,“粗放和集约地租的区别在经济思想史中是随着李嘉图著作的问世才泾渭分明;虽然在此之前有许多经济学家曾在不同场合讨论过这些概念(例如安得森,1777年)”。他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可追溯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初版于1817年)。

对于概念内涵,他认为科尔奈把“粗放”和“集约”概念与西方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划分联系起来,不仅不符合这一对概念提出的历史,而且两者在语义上也是不同的。他据李嘉图关于这一对概念的使用,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方式来区分这一对概念:同量资本和劳动投于不同的土地,就是“粗放”;同量资本和劳动投于同一块土地,就是“集约”,得出并不涉及要素投入是否增加的问题之结论。他还认为,把产出增加分解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因素,尽管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作为增长方式的两种类型却是不可取的。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总是相伴发生的。由此他认为以“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界定“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内涵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欠妥,尽管实际增长过程中既有要素投入增加,又有生产率提高,但现代增长经济学已有方法将两者加以离析并比较其相对大小。该作者还指出,崔援平等人关于农业和工业中“粗放”与“集约”概念内涵的界定,也是不科学的。“宝钢”无论是它所占用的土地,还是它所加工消耗的原材料,平均说来都远远高于其它钢铁企业。如此说来“宝钢”应列入“粗放”范畴了。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他还反驳崔援平等人认为土地和原材料不属资本的论证,将土地、原材料等归入资本

范围。由此,他认为“粗放”和“集约”与“外延”和“内含”意义相同,只是同一英文“Extensive”与“Intensive”的不同汉译而已。最后,他给出的界定为:粗放就是把资本投入与第一个企业并存的另一个独立企业,而集约指资本用来扩大原有企业。我们认为,这种界定过于狭隘,且会造成混乱。对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同一资本投入另一企业和同一企业的选择取决于投入边际收益比较。有可能在投入同一企业时会耗用更多资源,本质上却是“粗放”的。国内文献围绕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方式途径和制度因素等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观点颇多,这里不必一一分析。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增长方式分类的方法。在现有大量观点中,一种对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换为“集约型”的必要性表示迷惑的推理显得较深刻,值得讨论。这种意见认为,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用多少各种不同资源、劳力和资本,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若某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则增长方式采取“粗放型”是合理的。随着不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变化,增长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从较为粗放转变为较为集约。许多发达国家已完成的这种自然转变说明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自然性。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增长中投入较多的劳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是符合这一经济学规律的。事实上,改革 10 余年来东南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就主要是由利用我国劳力丰富而发展劳动密集经济带来的。因此,既然我国通过以往的“粗放”增长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进步,说明我国现阶段采用粗放增长是合理的,为何要人为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即使目前已走完了粗放增长道路,向集约增长转变也仅由增长的自然过程完成,何必要通过政府干预人为推动?最后,粗放与集约是相对的,用何种指标刻画增长方式的集约度(或粗放度)、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如何?目标增长方式的集约度应达到

多大才合理等……这一系列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能等闲视之,迫切需要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答复为何要强调转变增长方式的质疑。诚然,在发达的理想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反映了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并引导经济沿着合理的增长方式轨迹发展。但是,即使十分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存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资源环境问题恰属于外部性最集中最典型的领域。因此,当因外部性使市场价格不能准确反映稀缺性时,转换增长方式就需要政府干预。战后西方国家广泛推行高增长政策,但同时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问题,导致 70 年代的环境运动和学者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正说明了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完成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增长方式转变也离不开政府干预,如发达国家在 70 年代以后对环境保护进行立法,鼓励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实施等。因此,说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其次,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难以通过价格信号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前面给出的有关数字表明,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已严重到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的程度,这种信号通过政府统计和管理机构的呼吁而非市场价格提供出来。因此,事实表明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辩的,同时也需要政府人为推动。至于用何种指标刻画增长方式的集约度(或粗放度),国内文献已给出多种建议,如有人提出增长有 50% 以上是因投资效率提高而引致的就可称为集约增长(于天义等,1996)。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乎缺乏根据。若按此说法,我们应将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定为投资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必须高于 50%。为何是 50% 呢? 这一数字有何意义呢? 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为 49% 的增长方式就不是集约而一定是粗放的吗? 这一定

义将集约与粗放用一人为设定的临界点截然分开,其合理性明显值得商榷。同时,即使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50%,甚至如 99%,是否一定能保证可永续利用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否可保证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低于其灭绝阈限?一句话,在本质上看,是否能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证增长能无限持续下去?另一些人认为,集约与粗放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粗放到集约是连续的,如某一增长方式粗放度较大、集约度较小,增长方式转变只是从集约度较小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度较大的模式而已,不存在某一临界点。譬如,现有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小,仅为 28% 左右,今后 15 年要力争提高到 50% 以上。这种说法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官方政策目标,但仍然存在上述问题,即不能保证即使在其定义的集约增长方式下的增长能无限持续下去。因此,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不是别的,应是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这样,我们就自然将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与可持续联系起来了。通过对可持续增长方式进行数量刻画,发现增长可持续的临界标准,用这种标准或条件反回去定义集约(或粗放)增长方式,或给出刻画集约或粗放度的指标,正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和中心任务之一。我们与国内一些学者不同时但独立地提出了可持续增长方式目标模式概念,但我们提出了具体模型并给出了指标(蒲勇健,1996),较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更进了一步(袁嘉新,1996;邓启惠,1996)。我们这一思路完全突破了现有从集约或粗放概念出发,或约束于陈旧概念研究增长方式的框框,反过来直接从增长方式的目标模式即可持续增长方式出发,对集约与粗放给出一种新颖的、可测算的诠释,同时,还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联系起来,不仅证实了现有文献关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直观描述(曾培炎,1995),而且还进一步给出了这类关系的细